

■ 中国政治

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容

王海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0)

[作者简介] 王海琳(1957-), 男, 湖北武汉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和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

[摘要] 客观地评价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 应该肯定其中所具有的合理内容。他较早地对中国资产阶级作出合理划分并揭示其两面性, 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对于他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和所谓“国民革命的公式”问题, 应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陈独秀; 中国资产阶级; 联合战线; 农民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3-0308-06

1923年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 人们通常认为, 这是其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形成的时期。长期以来, 人们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无情的批驳, 使许多问题得到了纠正和澄清,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 存在着简单化的全盘否定的倾向, 似乎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以外, 其政治思想中就不再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了。实际上, 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建党工作, 开始由建党时期向国民革命时期转变; “二七”罢工失败后, 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 国共两党关系由互相排斥转向谋求合作; 单一的工人运动逐步转向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 等等。新的形势给中国革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 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当时, 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也力图对中国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尽管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但只要人们以严肃的态度, 认真而科学地剖析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 就会发现其中确实具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合理内容。

一、对中国资产阶级作出合理划分并揭示其两重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不断调整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过程中逐步深入发展的, 而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 必须以科学地分析中国资产阶级为前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 政治、经济状况十分复杂。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遭遇, 给中国社会各阶级打下了不同寻常的烙印。这不仅使得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极为复杂, 也使人们的主观认识正确地反映这一实际问题更加困难。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缺乏基本的认识。中共“一大”曾把中国资产阶级等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 作为革命的对象, 提出了没收一切生产资料, 承认社会革命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的主张。中共“二大”纠正了一大的上述错误认识, 并且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出发, 把中国资产阶级作为“受压迫的劳苦群众”进行了具体分析。“二大”认为, 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 不能独立经营, 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佣中国账房、买办、经纪人等, 做他们掠夺中国的“中

间物”;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不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由此,大会得出结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此外,这次大会把国民党组织“广东政府”称为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还提出了“商业的和工业的资产阶级”的概念。这些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却十分笼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部分还缺乏明确的区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二大”把建立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样,如何进一步正确认识中国的资产阶级,成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22期上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出发,率先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具体的划分。他认为,在产业幼稚的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一部分中国海外侨商以及新兴的工商业家;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小工商业家。值得肯定的是,陈独秀在分析资产阶级这三个部分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依据他们不同的经济地位揭示出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同政治态度。

陈独秀所说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他认为,由于他们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条约之痛苦,受着封建军阀的压迫,不能大规模地发展工商业,因而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而官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始终靠帝国主义列强及国内军阀而生存,依靠“外人”的恩惠,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他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的货币财富,并与封建军阀相联系,成为封建的资产阶级。显然,这一分析揭示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买办性和封建性。由此,他得出结论,官僚资产阶级“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1](第257页),“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1](第258页)。至于“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无疑指的是小资产阶级。虽然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的夹缝之中,经济上所具有的不稳定性,错误地认为,他们因为所经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从而把他们归为“非革命”的一类,并且视之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不久他就纠正了这些认识上的错误,提出了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为小资产阶级,其企业因竞争而崩溃,生活不安,可以趋向革命的观点;并指出:“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1](第363页),从而最终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上述划分,把中国资产阶级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突破了传统观念,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理顺了思路。中共“三大”把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人(即财阀)和中产阶级,就是在这一思路得出的结论。

陈独秀不仅对中国资产阶级作出了合理划分,而且进一步分析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两重性。1923年12月,他在《前锋》第2号上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指出,一方面,当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到军阀扰乱,外货外资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使他们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无疑,这表现为革命性。另一方面,陈独秀根据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涣散软弱、缺乏革命朝气和战斗力的状况,揭示了资产阶级与军阀、列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指出:“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它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1](第363页)。这些分析,勾勒出了资产阶级既害怕革命,又在一定条件下有革命要求的矛盾特性,这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在陈独秀看来,资产阶级的“懦弱心理”只存在于其“初步积累”时期,一味地强调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以非政治的态度——和平的政治运动的态度——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轨迹发展的,这又使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受到很大的局限。

二、提出了各阶级合作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

中共“三大”前后,正是酝酿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国民革命的重要关头。这一时期陈独秀顺应时势,为实现各革命阶级的合作而奔走呼号。他对于建立各阶级合作的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论述,在他这一阶段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第一,论述了各阶级合作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压迫和残暴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立足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具体实际,陈独秀提出了各阶级合作、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早在 1922 年 5 月,他就在《广东群报》上撰文,提出了“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1](第 182 页)。这一主张,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各革命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思想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后,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公开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并在中共“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二七”罢工发生后,陈独秀联系反军阀斗争实际,强调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性。1923 年 2 月 7 日,他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希望各界认清当时发生的北京学生向国会请愿遭警察殴打、京汉铁路工人成立总工会的大会被军警解散两件事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指出这两件事是一般国民失去了自由的问题,而不单是学生、工人的问题,号召各界人士同时速起,为自由而战。不久,他又在《统一的国民运动》一文中批评了对工人罢工袖手旁观,商界对学界、工界与军阀血斗置之不理,他方隔岸观火等现象,进一步指出,军阀未可轻视,政权武器都在他们手里,敌强我弱,“若是没有组织力量很强的很广大的民众运动,还怕是敌他们不过”。所以要打倒军阀,“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1](第 247 页)。毫无疑问,陈独秀关于统一的国民运动的思想是对二七罢工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他认为,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1](第 370 页)。“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1](第 371 页)。具体地说,就资产阶级而言,其势力微弱,尚不足以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惟一的“活路”,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共同的敌人。就劳动阶级而言,他们具有革命的实力,是革命运动的重要成分,由于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敌人,因此可以联合起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尤其是中国无产阶级,“应采取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争斗范围以内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2](第 141 页)。

第二,批评了共产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由于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严重斗争形势缺乏深刻的认识,也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因而在对于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上,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中共一大就采纳了党内存在的“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产阶级应该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的意见,作出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决定^[3](第 6 页)。中共二大虽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但是党内依然有人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加入进去,会与资产阶级混合,丧失党的独立性。此类错误认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妨碍了二大决议的贯彻执行,使得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实际上未在全党展开。

1922 年底,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俄举行,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他在会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这次大会同 1921 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

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2](第141页)。他认为,这两个策略是中国无产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应该遵循的“根本原则”。可是,直到党的三大,党内还有人反对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方式,认为“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4](第276页)。为了贯彻党的三大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陈独秀批评了党内的关门主义错误倾向,指出:“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才是极其危险的^[1](第369-370页)。

第三,否定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热衷的暗杀、暴动和不合作主义,力倡各阶级合作的国民运动。19世纪末兴中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是以少数人的暗杀、或是一时无组织无系统的暴动来实践自己的政治愿望,再者就是把消极的不与政府合作当做改造社会的方法,这些最终都没能使他们如愿以偿。陈独秀认为,政治之根本的改造,只有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即统一的国民运动,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而暗杀、暴动及不合作自来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改革家”的浪漫倾向,这些在迫切需要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条件下,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或隐或显地照例扮演出来了。

陈独秀认为暗杀只是一种个人的浪漫之举,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不仅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改造社会,进而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这种方法决不可能推翻统治阶级。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关于暴动,陈独秀指出,我们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暴动,我们所反对的是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一时冲动的暴动。这种浪漫的暴动,决不能在实际上推倒旧统治阶级的势力,决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至多不过快意一时。至于不合作主义,只会引导民众离开积极革命,走上消极的和平退让的道路。总而言之,这类暗杀、暴动、不合作主义,最终不过是“革命的障碍物”。革命联合战线“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2](第142页),“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1](第370页)。

三、对农民阶级的客观分析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以耕织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生活中长期顽固地占据着主导地位,使中国成为一个落后的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国家。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经济状况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使农民阶级在中国社会舞台上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这一时期陈独秀对农民阶级的分析,集中体现在《中国农民问题》(1923年7月)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等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把农民和地主划分为5个阶级10种类别。地主阶级分为大、中、小三类;中产阶级即富农,分为自耕农民兼地主和自耕农民兼雇主;小有产阶级即中农,有自耕农民和自耕农兼佃农两类;半无产阶级即贫农,包括佃农兼雇主和佃农;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这一划分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农民问题,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邓中夏对此也曾作出了“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很正确,读者可去参考”^[5](第53页)的评价。

陈独秀在分析农民问题时,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认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1](第366-367页)。在这一基本前提下,陈独秀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民阶级对于革命运动的状况。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

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1](第 367 页)。应该说,陈独秀对中国农民的分析是客观的,也符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片面地依据陈独秀对农民难以加入革命的 3 种原因的分析,指责他否定农民的革命性,这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中共党内其他卓越领导人,都曾指出过农民阶级所固有的弱点。马克思认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小农的生产方式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如此等等。马克思所谈到的不正是农民阶级的自私性、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吗?在陈独秀之后,邓中夏也认为农民有着“居处散漫,安土重迁,不易集中其势力”的弱点^[5](第 102 页)。其实,陈独秀也看到了“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1](第 367 页)。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低估小农经济条件下,落后生产方式对中国农民的影响和束缚。否则,对于中国革命没有任何益处可言。实际上,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各阶级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时代的印记。陈独秀敢于正视现实,看到了农民阶级固有的弱点,才认识到通过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宣传,建立农民组织,开展实际运动,来解除农民的痛苦,进而引导农民加入国民运动^[1](第 318 页)。若认为陈独秀完全否定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就很难从逻辑上对他为何要探讨引导农民加入革命运动的具体方法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四、所谓“国民革命公式”

在评价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时,人们一直认为陈独秀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国民革命公式”,具体来讲指的是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一提法被说成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6](第 512 页)。“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7](第 673 页)实际上,把陈独秀的这一主张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的分析,是不应该得出简单的、片面的结论的。从国民党当时的情况来看,陈独秀是针对国民党上层在联共改组问题上存在的种种阻力提出自己的主张的。1922 年 8 月,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后,中共代表李大钊、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多次与孙中山会晤,商讨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问题。但是,联共改组一开始就在国民党内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在国民党上层,除了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联共改组派以外,既有居正、田桐、谢持、冯自由等顽固派,也有张继、邹鲁、戴季陶等中间派。顽固派宁可投奔到北洋军阀的门下,也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中间派表面上服从孙中山,暗地里却与顽固派串通一气,鼓动反共风潮。此外,还有人担心联共会招致列强反对,甚至提出共产主义不同于三民主义,存在种种疑虑。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指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使之“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其目的无疑是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

从这篇文章内在的逻辑联系来看,陈独秀是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首先,陈独秀认为,虽然辛亥革命从性质上讲,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从事革命运动的主要分子却大部分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而是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辛亥革命既没有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也没有得到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其结果只能是“一二个伟大人物”主持而造成的奇迹。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运动中,革命党就必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否则,就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陈独秀指出,这正是“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1](第 256 页)。由此,他得出结论:在革命运动中,中国国民党必须抛弃拒绝资产阶级的“浪漫的左倾观念”,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其次,陈独秀是在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陈独秀不仅把中国资

产阶级分为三个部分,而且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使革命党易于采用与官僚资产阶级妥协的右倾政策;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才是革命党眼前的一条活路;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必然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一边,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陈独秀特别强调:上述道理“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1](第258页)。总之,幼稚的资产阶级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中国国民党应该抛弃与官僚资产阶级妥协的右倾观念,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使国民革命得到完全实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陈独秀并没有提出什么“国民革命的公式”,在被人们说成“国民革命公式”的这句话里,也没有什么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的问題,更不是什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他完全是出于消除国民党内国共合作问題上存在的种种疑虑和障碍,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实际需要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毫无疑问,这也是符合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方针的精神的。

[参 考 文 献]

- [1]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2] “二大”和“三大”[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3]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5] 邓中夏.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6] [俄]列 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7] [俄]列 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叶娟丽)

Rational Content of CHEN Du-xiu's Political Thought around the Third Congress of CPC

WANG Hai-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Wuhan 430060,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Hai-lin (195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Kuomintang.

Abstract: We should affirm the rational ones when appraising political thought of CHEN Du-xiu which around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was CHEN Du-xiu who early divided Chinese capitalist class and brought to light the dual character of them. He also put forward a proposal of forming the untied front of national revolution. We should make an objectively analysis of concret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when evaluating CHEN Du-xiu's thought of Chinese peasant issue and *the formula of national revolution*.

Key words: CHEN Du-xiu; Chinese capitalist class; united front; peasant